

污衊黎案為「政治審判」是黔驢技窮的政治操弄

12月15日，香港特區法院依法裁定黎智英串謀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、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等罪名成立。特區法院在判決中清楚表明，黎智英並非因其政治觀點或信念受審，法庭單純考慮有關的法律和案中證據，以決定控方是否已把各被告面對的控罪證明至毫無合理疑點。然而，外部勢力仍「不約而同」跳出來攻擊抹黑，將此案污衊為「政治審判」，赤裸裸地挑釁香港司法獨立和審判公正。

青平

其實，自2023年12月黎智英案開審以來，外部勢力便上演了一齣拙劣的「洗白大戲」——將這個反中亂港的罪魁禍首包裝成「政治犯」「民主人權鬥士」，妄圖把法律案件扭曲為「政治檢控」「政治審判」，還聒噪着要求無條件釋放黎智英、廢除香港國安法。他們的如意算盤最終難以打響，裁決顯示黎智英違法犯罪的事實鐵板釘釘，任外部勢力如何巧舌如簧，都無法為其滔天罪行洗白分毫！

黎智英不是「政治犯」而是罪行累累的刑事犯

根據法庭查明的鐵證，黎智英因扭曲的成長經歷而仇視中國共產黨領導，非法「佔中」期間，他將《蘋果日報》打造成一份「反對特區及中國政府的報紙」。修例風波期間，他利用《蘋果日報》發布161篇煽動文章鼓動市民上街，挑動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憎恨及對抗。在特區政府撤回修例草案後，他和《蘋果日報》仍走在「抗爭」運動最前線，逐步推動示威活動演變成暴力抗爭運動。

不僅如此，黎智英還以《蘋果日報》為平台發表反華報道和評論，請求外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所謂制裁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。此外，他作為主謀，與「重光團隊」互相勾結，投入巨資開展國際游說，請求外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。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，黎智英等仍明裏暗裏實施反中亂港活動。黎智英的所作所為，絕不是和平表達政治主張，而是徹頭徹尾的賣國行徑，嚴重觸犯香港國安法、香港特區《刑事罪行條例》。

黎智英案審判是兼顧維護國家安全與人權保障的典範之作

長期以來，由於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存在短板，黎智英之流的反中亂港分子得以肆無忌憚地興風作浪，直至修例風波爆發，香港陷入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動盪局面。即便如此，在此背景下制定的香港國安法在明確罪行和刑罰時，仍堅守現代刑事法律的核心原則——罪刑法定原則，並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權。儘管黎智英罪大惡極，香港特區法院仍充分保障其各項訴訟權利。

歷經156天的公平、公開、公正審訊，黎智英由香港資深大律師彭耀鴻、多位本地律師、新西蘭籍御用大律師Marc Corlett代表，並在其中52天出庭自辯。控辯雙方充分交鋒，審視了多達2,220項證物、逾8萬頁文件、傳召14名控方證人，事無巨細地呈現相關法律原則和證據，完全符合普通法公開審判、對抗制訴訟、詳細說理、嚴格證據規則、交

證據充分邏輯嚴密  
黎智英罪有應得

彭韻儀 全國政協委員



備受社會關注的黎智英案，日前終由法庭頒下判決。在案件審理期間，社會各界高度關注，當判決結果出爐，我們更應深入研讀判詞內容，體會其彰顯的法治核心價值。

香港的司法制度最為人稱道的一點，便是其完全的公開透明。所有判決判詞，無論長短、無論涉及何人，都會上載至司法機構的網站，供公眾、法律界及傳媒隨時查閱。這種制度設計不僅提升了司法的可問責性，也強化了社會對法治的信任。透過公開判詞，市民得以了解法官如何理解證據、適用法律，並最終作出結論。這正是法治社會與專斷統治的根本區別所在。

專業嚴謹 獨立審判

黎智英案的判詞就是最好的證明。它不是一個簡單的「有罪」或「無罪」的結論，而是一座由事實、證據和法律論證構建起來的詳盡「法律先例庫」。它向全香港、全世界清晰地展示了法庭是如何分析證據、如何理解和適用法律，以及如何得出結論的。這種全面公開的做法，正是對無理質疑與攻擊最有力的回應。尤其在全球資訊混雜、假新聞橫行的時代，司法透明成為抵禦誤導與煽動的重要防線。

這份判詞的長度，正正反映了香港司法的嚴謹與負責。法官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，梳理每一份證據，審慎評估每一個法律觀點，並以嚴密的邏輯作出分析和判斷。這不僅是對被告人的尊重，也是對整個社會的交代。在重大案件中，詳盡而細緻的判詞往往代表着對程序正義的高度重視，也展現了司法機關不顧草率定讞、力求公正的專業態度。

在香港，司法獨立是基本法核心原

則，基本法第八十五條寫明：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，不受任何干涉，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。」這是我們法治的「定海神針」。法官在審理案件時，不會受到任何來自行政、立法或任何外部的干預，每一個判決必須基於證據和事實。這種制度安排，確保了司法權能真正發揮其作為社會最後一道防線的功能。即使面對政治壓力或輿論風暴，法官仍能秉持專業良知，依法作出判斷。

法律面前人人平等

法治的另一個核心支柱是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」。在香港，任何人，不論其社會地位、財富、權力或職業，都必須遵守相同的法律，並在相同的法律框架下接受審判。這項原則看似簡單，卻是現代文明社會賴以運作的基石。一旦此原則被動搖，社會便可能陷入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，公民的基本權利亦將失去保障。

黎智英身為前傳媒機構負責人，在香港的法庭上，「傳媒」這身份並不賦予任何人特權，同樣也不成為任何形式的歧視或偏袒的理由。法庭審理的是被指控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，證供是否足以證明罪行，而不是被告人的身份或職業。這次判決重申原則：法律是平等地保護每一個人，也平等地約束每一個人。無論是普通市民還是知名人士，在法律面前皆無例外。

黎智英案件的判決，展示了一個獨立、專業及透明的司法體系是如何運作的：以公開透明的程序為基礎，嚴謹的邏輯和扎實的證據為依據，堅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。這不僅是對個案的處理，更是對整體法治秩序的維護。一個健全的法治社會，不會只靠單一案件來證明其價值，但每一次公正的判決，都是對法治信念的一次鞏固。

## 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優勢不可替代

張量童



如果將國家創科體系比作一條完整的創科生態鏈條，筆者認為，北京負責源頭創新，上海負責工程化與產業化，香港則負責國際化與制度型開放。三者不是零和競爭，而是分工合作。愈是強調北京與上海的科創中心地位，愈能凸顯香港的不可替代性。

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同時提出三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：北京國際科技創新中心、上海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。這一部署標誌着國家創科戰略邁入多中心、分工明確的新階段。有香港輿論因此產生疑慮：既然北京和上海都被定位為國際科創中心，香港的角色是否被邊緣化？香港的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定位會否被弱化？這種擔憂未免過慮了。原因在於三地的科創功能並非重疊，而是分工互補、各司其職。

一、北京的定位高度明確，其為源頭創新的主陣地，也是國家戰略科技研發的核心承擔者。

北京聚集了全國最密集的科研院所和國家實驗室，專注於原始創新和「從零到一」的突破，並肩負量子、空天、材料、人工智能等戰略性科研任務。這類科研具有高度的國家屬性和保密性，香港既不可能也無需與之競爭。

香港的功能在於承接北京的科研成果，推動國際科研合作，促進科研成果商品化，建立人才流動制度，管理國際科研資金，並提供法治和知識產權保障。換言之，北京負責「從零到一」的創科研發環節，香港連同深圳則負責「從一到一百」的創科中試轉化環節。北京和香港形成創科接力而非替代關係。

二、上海的定位則偏向產業化與工程化。

上海在生物醫藥、集成電路和人工智能等領域具備強大的工程化能力，並依託科創板形成「科研—資本—產業」的閉環。上海的角色是把科研成

果轉化為產業，並進一步擴展為規模化的市場，這是香港不具備的能力。香港的功能在於提供國際融資平台，作為國際規則的接口，承擔仲裁與爭端解決的角色，並成為全球資本與專業服務的中心，同時為內地科技企業「走出去」提供跳板。換言之，上海推動內地的科技產業化，而香港則專責吸引資本驅動創新，以及助力內地科創「出海」，開拓國際市場。

三、香港的創科定位，從來不是科研量或產業規模的競賽，而是在國家多中心科創格局中，承擔唯一的「國際化、制度型、外循環」功能。

這些功能北京與上海都不具備，也在短期內無法複製。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使其能與國際規則接軌，提供科研合作、仲裁、知識產權保護、資金管理和合規審計等必要條件。香港同時作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和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，是內地企業海外融資的首選平台。北京和上海的資本市場仍以內地投資者為主，國際化程度無法與香港相比。

此外，香港還具備科研人員自由流動、國際科研資金在港使用、科研倫理審批制度以及合作協議法律保障等制度優勢。更重要的是，香港與深圳形成了「制度+產業」的獨特組合：香港提供制度和國際化平台，深圳提供工程化和量產能力，這種跨境互補是北京和上海都不具備的。北京不可能成為普通法區域，上海不可能成為離岸國際金融中心，兩地都不可能成為「一國兩制」下的制度型開放平台。

因此，香港的角色不是被削弱，而是更加強化。香港的創科定位不是比規模，而是比不可替代性。這種功能不是靠投資、政策或建園區就能複製，而是香港在制度、法治、國際化、金融和人才流動等綜合優勢的結晶。北京與上海的科創中心地位提升，反而讓香港的角色更清晰：北京做源頭創新，上海做產業化與工程化，香港則承擔國際化與制度型開放。這正是香港在國家創科戰略中的真正價值。

## 積極融入「十五五」大局 推進高質量發展

黃錦良 全國人大代表 候任立法會議員



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會見赴京述職的行政長官李家超，聽取他對香港當前形勢和特區政府工作情況的匯報。習主席表示，「中央對李家超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。」習主席對香港的重視、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工作的充分肯定，對「東方之珠」未來建設發展的期望，情真意切，不僅激勵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，也是對全體香港市民的鼓勵，為香港社會注入強勁動力與精神鼓舞。

習主席會見李家超時指出，「特別行政區政府要主動對接國家『十五五』規劃，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，扎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，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，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。」

### 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

過去一年，香港的「一國兩制」實踐進入新階段。在中央支持下，行政長官李家超和特區政府，凝聚社會共識，築牢國家安全屏障，落實「愛國者治港」原則，全力「拚經濟、謀發展、惠民生」，經濟、民生等各項事業向前發展。這一年間，香港完成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附屬法例立法，參與聯合舉辦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，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並開始運作，第八屆立法會選舉順利圓滿舉行。日前，黎智英案法庭的定罪判決彰顯法律正義，維護了香港核心價值。

新年的鐘聲即將敲響，國家發展即將進入「十五五」時期，香港的「一國兩制」實踐亦將展開新一頁。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「十五五」規劃建議，擘畫了國家未來五年發展，亦對促進港澳長期繁榮穩定作出專門部署，這是香港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機遇。李家超述職後會見傳媒時強調，特區政府會主動對接「十五五」規劃建議，全面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，積極參與和貢獻粵港澳大灣區建設、高質量共建「一帶一路」。

李家超在今年9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特別提到，這份施政報告既是香港全力「拚經濟、謀發展、惠民生」、加快邁向「由治及興」的進程表，亦是香港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、實現突破新局面的策略部署，當中包括深化改革，強化治理體系，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，產業發展和革新等

政策和具體措施。

### 加快實現社會由治及興

深化改革，強化治理體系，是特區政府不斷提高管治水平和管治能力的重要環節。「十五五」期間，國家對特區政府的管治效能有更高的要求 and 期待。「十五五」規劃建議有關港澳的部分，提到「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」。習主席在聽取述職報告時，指出要「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」，寓意深刻。特區政府要不斷推動自身建設，行政立法相互監督又互相配合的新風氣需要延續並增強，良好的議會文化需要傳承和發揚。同時，特區政府要強化「以產業導向」政策，加強協作，更好地將「有為政府」和「高效市場」結合。

北部都會區是香港的戰略發展區域，具有巨大經濟價值和發展潛力，將於「十五五」時期成為香港經濟建設和創新發展的關鍵所在。目前，北都發展的決策層次已經提升，特區政府還成立了「北都發展委員會」。作為大灣區融合發展的重大項目，特區政府要加強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合作，簡化行政流程，吸引更多創新科技企業和投資者，推進基礎建設，努力將諸如《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》、《新田科技城創科產業發展規劃概念綱要》等加快落實。

香港高等教育具有國際化和多元化優勢，基礎研究扎實；同時，香港也在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。「十五五」期間，香港要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，就要更好地強化與發揮這些優勢和特點的作用。正如有專家學者建議，香港要注重基礎研究，發揮各類科研平台作用，圍繞世界科技前沿和國家重大戰略需求，強化攻關，實現更多「從零到一」的突破。要促進「產學研用」創新協同，推進科研成果轉化。同時，堅持以平台建設集聚高端人才，通過高水平的研究平台、合作項目，集聚培養更多國際頂尖人才和創新團隊，為香港和國家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支撐。

融入國家「十五五」大局，必將有力推進香港高質量發展。社會各界要銘記中央對香港的支持與期待，凝聚共識，齊心協力，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，加快實現社會由治及興。